

只有依靠民主才能跳出“周期率”

王 昌 国

本文以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话谈“周期率”为线索,纵观社会的变迁、历史的发展和国家的兴衰,承认确有“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人亡政息”的“周期率”。古今中外的历史,均受这“周期率”的支配。剥削阶级的覆灭都是同其政权反民主、反人民、搞腐败分不开的。谁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国共产党是以百倍的警惕对待这个问题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使党政领导干部不敢松懈,只有反腐倡廉并敢于碰硬,只有在理论与实践上解决好主人与公仆、监督与被监督、民主与法制、两手抓与两手都要硬等关系,才能取信于民,也才能跳出“周期率”。

作者:王昌国,男,1938年生,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副教授。

要解决谁能跳出“周期率”的问题,需要明确以下几点:有没有“周期率”?什么是“周期率”?如何才能跳出“周期率”?

有没有“周期率”?以唯物史观的立场和观点来观察社会历史和现状,应承认有“周期率”。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周期率”是带有规律性的现象。

什么是“周期率”?如何才能跳出这种“周期率”?毛泽东与黄炎培(字任之,社会人士尊称为“黄任老”)在延安话谈“周期率”,讲述得很清楚。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等五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延安,受到中共中央的热烈欢迎。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到他家里作客,畅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谈到延安整风的情况,诚恳地说:从多年的革命实践中,觉悟到过去的种种错误,错就错在中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流毒。

当时,毛泽东问黄炎培:你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受?由于毛泽东与黄炎培交谈得十分真诚,黄炎培很受感动,因而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

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①

古今中外,一部历史,确实存在这样的“周期率”并受“这周期率的支配”。谁能跳出“周期率”?如何才能跳出“周期率”?

毛泽东高兴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②

当时,黄炎培十分同意毛泽东只有依靠民主才能跳出“周期率”的观点,他说:“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③

延安之行,黄炎培深受启示与鼓舞,返重庆后即于1945年底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成为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

“黄任老”乃清末举人,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5年曾赴美国考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曾任国民参政员。解放后,曾任政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真可谓是三朝元老,见多识广。当时,黄老先生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毛泽东的回答也是理直气壮的。最根本的一条是,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利,依靠人民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必将也能够打破历史上屡屡出现的“其兴也浚焉”、“其亡也忽焉”、“人亡政息”的周期率。毛泽东的话,表达了共产党人的信念和决心。

找到一条“新路”是一回事,而走出一条“新路”又是另一回事。跳出“周期率”,不是一代、两代、三代、四代、五代能完成的,需要一代又一代,前赴后继,兢兢业业,百倍警惕,艰苦奋斗,反腐倡廉,才能跳出“周期率”。

二

当年,黄炎培访问延安,到延安考察,对共产党的艰苦奋斗作风和反腐倡廉精神表示敬佩,但对能否在环境变化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表示怀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并不是简单地回答“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而是以高度的警惕性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并以实际行动在理论与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

面对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形势,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党的工作重点将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城市领导乡村,告诫全党同志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讲过一段极为深刻的话:“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的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④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很有卓识远见的。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今天是进京

^① 黄炎培:《延安归来》,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157页。

^② 黄炎培:《延安归来》,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57页。

^③ 黄炎培:《延安归来》,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57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

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接着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进京以后,毛泽东对共产党内会不会产生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会不会发生贪污腐败等现象,是非常警惕的。他多次说:我们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一进城就变了。在新中国快成立之前,毛泽东当着中央和大区的一些负责同志的面说,新中国快要成立了,我们这些人将来都是要上历史的,不能象李自成进北京那样,要约法几章。足见面对全国胜利的形势,怎样预防执政后重蹈李自成式的因胜利而骄傲而腐败变质的覆辙,已成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反复思考的大事。

抚今思昔,毛泽东对此是铭记在心的。接管北京时,傅作义先生向我们提出过:国民党取得政权后20年就腐化了,结果被人民打倒了。共产党执政后,30年、40年以后是不是也会腐化?^①这并非是危言耸听,而是党外诤友的逆耳忠言。我们能不能跳出“周期率”?毛泽东一是充满信心,“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二是百倍警惕,一发现苗头,就及时敲警钟,坚决纠正,甚至绳之以法。

中共中央、毛泽东在1951年底发动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这是共产党执政后,自觉地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腐蚀、保持共产党人廉政为民本色的一次成功实践。在“三反”运动中,处决刘青山、张子善,不仅在当时起到了伸张正义、惩治邪恶的效果,而且直到今天,人们还记忆犹新、深受鼓舞。当年,中共中央、毛泽东抓反对腐败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一旦下决心抓,就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共产党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和魄力,真正做到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三反”运动中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英明果断决定,表明共产党用实际行动向全社会、全世界宣布,共产党决不会做李自成,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和蔓延,决不会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

要跳出“周期率”,除从严治党、党要管党、教育好干部外,还要教育好自己的子弟,培养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既相当艰巨而又十分紧迫的任务。同样,毛泽东给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1946年2月毛泽东便送儿子上“劳动大学”,一直为群众所传颂。1950年,美国发动侵朝战争,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和美国侵略者正面作战。当时,患恐美病的不少,毛泽东却为儿子向彭德怀说情,亲自送毛岸英上前线。毛泽东对子女的要求也是严格的,不准子女搞特殊化,不准用公车接送子女上学。他常说: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化。并告诫子女:你是毛泽东的儿子,要严格要求自己。周恩来总理也给后人树立了典范。他不让在身边长大的侄女周秉建来北京落户,而叮嘱她在内蒙古扎根。临行时,周恩来举行家庭宴会,用苦瓜为侄女送行,教育她要准备吃苦,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群众打成一片。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天下为己任,没有一丝半点私情私利,高风亮节,永远受到群众的敬仰。

解放初期,毛岸英的一位表舅向毛岸英和毛泽东求助,希望能帮助他的一位亲戚在长沙谋个“厅长方面的位置”。毛岸英给他的表舅写了一封表现共产党人正气的回信:“来信中提到××,‘希望在长沙有个厅长方面的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7页。

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之外,正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动人民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殊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家族有关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别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加以巩固并努力于倡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的途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我决不能也不愿违背原则做事,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①毛岸英给表舅的信,句句铿锵,掷地有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执政为民、不以权谋私的革命本色。今天读来,令人感慨系之。毛岸英言行一致,以自己高尚的革命情操和光辉的实践,为高干子弟树立了好榜样,交了一份永不褪色的考卷,真不愧是党的好儿子、人民的好儿子、毛泽东的好儿子。

三

建国后,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不失时机地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成功地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开创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并认真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一个艰难曲折的时期,在探索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其动机与目的,都是为了跳出“周期率”,建设新中国,永葆人民江山。他们一心一意为人民谋利益,没有私心杂念。虽有失误,也是好心好意办错事,群众也能理解和谅解。何况,共产党能自己总结经验教训,公开承认错误,自觉纠正错误。这样的党,虽然犯了错误,依然不愧是伟大的党。无怪乎,现在人民群众十分怀念当年的党风和社会风气,称赞当时的廉政建设状况、干群鱼水情以及良好的社会治安状况。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拨乱反正,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上发扬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②。同时,非常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告诫全党,工作中心转移之后,仍然要十分重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要求全党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都是为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跳出“周期率”的支配。

邓小平特别注意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经常考虑“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的大事。他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出来后,就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发现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

^① 《学习文选》,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54、5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

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人,真正要找第三代。但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称是第三代。”“现在中央的班子干得不错嘛。”^① 中国的事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共产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也要靠这一条。要跳出“周期率”,也要靠这一条。对执政党来说,还是要靠这一条,才能完成“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的任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靠干部去贯彻执行。“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② 这话是正确的,并没有过时。现在的问题是歪嘴和尚有之,偷梁换柱的有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有之,拒不执行的有之。应当严肃党纪,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先后作出了若干重要决定,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推动惩腐倡廉工作的开展。1991年初,江泽民总书记到湖南考察工作时,作了重要指示,要求开展“三重温”活动,即重温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两个务必”的教导,重温《甲申三百年祭》,重温毛岸英给他表舅的信。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温这三篇重要文献,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的廉政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面临的考验是很多的,但我认为最严峻、最现实的考验是两个:一个是经济建设能不能搞上去的考验;一个是能否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的考验。这两个考验都是关系党和国家的兴衰成败和生死存亡、能不能跳出“周期率”的大问题。经济建设搞不上去会翻船,党风不好、腐败成风也会翻船。“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是历史经验总结,也是现实的教训。要经受这两大考验、跳出“周期率”的根本之计,就是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共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一贯主张的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

最近,中共中央对深入开展反腐斗争作了认真研究,制订了更坚决的措施,进行了新的部署。这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我们要坚决按照中央的部署,把反腐败斗争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抓好。

现在存在的问题是,有的人、有的人单位、有的地区和部门,对贯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很不自觉,或者阳奉阴违,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贯彻中央反腐败的决定和措施,说得多做得少,或者只说不做,或者等待观望,或者只打苍蝇不敢碰老虎;有的把反腐败同发展经济对立起来。以上种种都是不正确的。我们所进行的各项工作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于这个中心,不能干扰这个中心。开展反腐败斗争,是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不坚决克服腐败现象,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就不可能取得成功。把反腐败同经济建设对立起来,同改革开放对立起来,认为反腐败会影响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在反腐败过程中,不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注意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也是不对的。总之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能等待或观望。如果经济建设上去了,而党风败坏了,将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邓小平同志曾一针见血指出:“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38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①江泽民同志最近也指出,如果风气滑坡,经济上去了,也会垮下来。腐败现象有其滋生的规律性,放任自流,就会像瘟疫一样四处传染。南美和非洲一些国家,就是因为腐败蔓延,才使国家陷入内战和贫困。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腐败丑闻接连不断,高级官员下台,政府危机垮台的事时有发生。

消极腐败现象的滋长和蔓延,不仅会直接影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而且严重损害共产党的形象和威信,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曾记否?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有些人卷进去,就是与此有关,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风波平息之后,邓小平同志尖锐地指出:“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有失败的危险。”^②这是邓小平同志对全共产党的告诫,针对性十分强,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反腐败问题上已获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涌现出大批廉政、勤政为民的先进人物。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谁廉谁贪,谁好谁劣,心中有数,一清二楚。当年的焦裕禄,今天的胡富国就是密切联系群众、廉政勤政的典范。^③我们之所以能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就是因为我们的党有许多焦裕禄、胡富国式的好干部、好党员。人民群众是拥护反腐败的,这使我们拥有同腐败做斗争的基本条件。如果不充分利用我们的有利条件和时机,深入进行反腐败斗争,如果等到腐败数量越来越大,由量变引起质变,那时再来收拾局面就为时已晚。“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④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教导,语重心长,应引起我们深思。我们只有依靠民主,由人民当家作主,实行严肃地自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的有效的监督,才能克服腐败现象;我们只有加强法制,从严治党,执行党纪国法,毫不留情地清除腐败分子,才能使共产党和国家的肌体不受蠹虫的侵蚀,永保健康。

资本主义国家因腐败导致政治危机,可以撤换几个政客,更换另一个政党组阁,可以用改头换面的方法,继续维持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社会主义国家在腐败问题上出现了问题,就要翻船。东欧演变、苏联解体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执政党腐败了,脱离人民群众,失去民心,给反对派以口实。结果,丧失了政权,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

1300多年前,唐太宗曾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⑤东欧、苏联没有跳出这种周期率,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48年前,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话谈“周期率”,确系警钟长鸣,意义深远。“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是千千万万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要把信念、决心化作实践,依靠民主,反腐倡廉,跳出“周期率”,我认为要在理论与实践上处理好四个关系。

1. 处理好主人与公仆的关系。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老问题,也是一个尚未解决好的问题。其所以说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老问题,是因为人们对这个问题并不陌生,大家都熟知马克思主义这些观点: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是历史的主人、是国家的主人;党和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所以说这又是一个尚未解决好的问题,是因为熟知不等于理解,理解也有深有浅,而要将理解变为行动、付诸实践、变成现实,那就更难了。判定认识和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页。

③ 参见《农民的儿子,人民的省长》,光明日报1993年8月5日。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⑤ 《资治通鉴》第13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184页。

理论正确与否,不是看他是否说得委婉动听,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而定。要解决主人与公仆的关系问题,关键是理论联系实际,言行一致,知行统一,道以一贯之。当前有些干部,不是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公仆,而是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败,怎么能跳出“周期率”呢?

2. 处理好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这也是一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问题。谁都会说,人民有权监督党和政府,党和政府的干部要接受人民的监督。这是由党的性质所决定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说是一回事,而实践又是一回事。开拓“民主新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人民有权对党和政府干部进行监督,被监督者不接受监督怎么办?人民群众要有“法”治他。现在有这种情况,群众不但治不了他,反而有受打击报复的、穿玻璃小鞋的。这就要建立监督制度,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批评教育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谁也不能占便宜,并使他们受到法制、纪律处分。这就使人想起了一度受上海百姓称赞的“506效应”。那是在1988年时,上海市长朱镕基上任之初,便立即对担任纪检、监察的同志交待:要把眼睛紧紧盯住市政府506个局长,要他们以身作则,奉公守法,克己奉公,廉洁清正。这个交待还登在上海的报纸上,于是506个局级干部事实上成了上海市千万市民的监督对象。到了1990年,朱镕基宣布,此举“现在看来有一定效果”。于是上海市委、市政府又把廉政规定延伸到市委、市政府系统在内的2000个局级干部,而且还进一步延伸到全市20000个处级干部。这是一个深得民心的举措,搞了两三年便有积极的成果。^①现在,全国反腐倡廉,任重道远,抓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只有发扬民主,实行群众监督,抓紧抓好了,就能取得阶段性成果。长期坚持下去,就能达到预期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让人民来监督我们党和政府的制度日益完善,我们进一步健全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还制定了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法》等法律,最近还公布了《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控告申诉工作条例》等法规,为从严治党、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发挥了巨大作用。今天,进行反腐败斗争,要建立党内党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监督制度,这是开展反腐败斗争的重要保证。

3. 处理好民主与法制的关系。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我们要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上,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共产党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讲民主,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区别开来。如果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抽象地空谈民主,那就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妨碍四个现代化的建设。

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建设,不仅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而且是进一步消除腐败、搞好党风建设的可靠保证,也是跳出“周期率”的法宝。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反腐倡廉,要靠教育,要靠制度,更要靠法制。邓小平同志多次讲:“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②又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

① 参见林木:《重提506效应》,人民日报1993年12月1日。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①有了健全的制度和法制,就能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领导人的变动而改变。现在,往往有这样的情况,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不用法治,而搞人治,是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的,是难以跳出“周期率”的。

4. 处理好“两手抓与两手都要硬”的关系。早在1982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不但对外开放政策肯定要失败,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也肯定要失败。有了打击经济犯罪这一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就可以沿着正确的方向走。”^②可是现实情况是,两手抓出现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一手硬,一手软是不能长久共存的,一手软必然影响、削弱另一手。硬的不能持久,终将软下来,软的一手,也必将更加软下去。10年之后,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又有针对性地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③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反腐败斗争,加强廉政建设,以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是邓小平同志和共产党的一贯思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展反腐败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和紧迫的任务。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严重影响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干扰阻碍国家宏观调控措施的贯彻执行,影响了共产党的形象。反腐败斗争要动真格的,绝不能失之以软,失之以宽,才能取信于民。否则,“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在共产党内部”^④。这是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又一次向全共产党提出的告诫。

只要我们真心实意为党为国为民,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就能获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反腐败,要动真的,干实的,就要按邓小平同志的教导办:“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是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效果也大。”^⑤我认为,拿出当年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决心,何愁反腐败不成,何愁不能跳出“周期率”。人民群众是看实践的,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

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使我们深深感到,依靠民主,开拓“民主新路”,反腐倡廉,跳出“周期率”,不可能一次完成,也不可能一劳永逸。的确,我们“已经找到新路”,也有信心“能跳出这周期率”,但任务尚未完成,全党必须继续努力。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现在还处于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

责任编辑:唐 军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页。

②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9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页。